

清代刻书名坊 客家文化精华——四堡书坊刻书研究

四堡遺珍

谢江飞 著



四堡遗珍

谢江飞 著

清代刻书名坊 客家文化精华——四堡书坊刻书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堡遗珍/谢江飞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615-4758-8

I. ①四… II. ①谢… III. ①清刻本-研究-连城县 IV. ①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466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25 插页:2

字数:500 千字 印数:1~3 500 册

定价: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连城县四堡镇在福建省区位图





谢江飞，男，1956年8月生，福建省武平县人，本科学历，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省委党校培训班党政专业毕业，现供职于厦门经济管理学院。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和文章100余篇，并多次获奖。兴趣广泛，能诗词，喜收藏，善书法。书法以“二王”为宗，兼学各体，真、行、草诸体皆擅，尤以草书为最，作品亦多次获奖。

作者简介

折桂每家深如翁实罕俦
 露以新服物家正不随流
 言诗人常才情应物德
 先著继述补后先即来家
 望再君碑去香孤乐丘

邹圣脉诗寿澹庵公六十加一
 癸巳年夏江飞




折桂多豪杰，如翁实罕俦。虚公能服物，严正不随流。真意待人笃，才情应务优。
 承先善继述，裕后克贻谋。家塾开闾肆，书香绍乐丘。

邹圣脉诗，寿澹庵公六十加一，癸巳年夏，江飞。

序

杨国桢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宋代以降，福建文化昌盛，有“海滨邹鲁”、“图书之府”的美誉，从事雕版印刷的匠户遍布全省。其中，闽北建阳书林、麻沙是闻名全国的刻书中心，从北宋至明末长达数百年持续不断，所刻之书号为“建本”或“麻沙本”。闽西汀州府从宋代起也有刻书的传统，所刻之书形成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前人称之为“汀版”。清代的“汀版”，又称为四堡刻本，是汀州府连城县四堡书坊生产的书籍产品。从清代初年起至民国末年，四堡乡邹、马二姓人皆以刻书为业，家有藏版，经营书坊持续时间长达三百余年，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书坊集群，所刻书籍林林总总，行销海内，名噪一时。然而，由于所刻之书大多为满足民间社会庶民生活需求的通俗文学、幼学童蒙、科举应试、应世便书、医书药方、居家日用、堪舆命理之类，为上层社会饱学之士所鄙视，鲜为收藏，以至大量散佚，今人对“汀版”即四堡刻本还十分生疏。

三十年前，即1983年，先师傅衣凌教授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被批准列为“六五”、“七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我协助傅先生组织课题组成员和研究生，开始到福建各地社会调查，访寻地方文献、民间文书，了解乡村社会的遗俗遗制。1985年初，我和陈支平、郑振满、魏洪沼一行，从龙岩到上杭、长汀，沿路访查，再之连城，第一次来到四堡，参观书坊遗址、遗存的刻版，查阅邹氏、马氏族谱，收获良多。唯独未睹四堡刻本图书，不能利用做社会生活史研究，深以为憾。

毫无疑问，“汀版”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的又一主要版别，对四堡刻本的搜集和研究，在版本学、印刷史、社会史等学科领域都有重要的意

义。令我感奋的是，厦大校友谢江飞先生用了15年时间，费尽心机，搜罗各类版本，得63个书坊所刻103种500多册，虽仅是四堡刻书总目的十分之一，却是当今海内外公私家度藏之冠，令人佩服。谢先生又结合其他文献和雕版实物，对它们进行一一梳理与研究，写成《四堡遗珍》一书，对历史上久负盛名而今人知之甚少的“汀版”的研究有所突破，填补了福建刻书研究的某些空白。

谢君此书，堪称我国首部研究清代“汀版”源流与版别的学术性专著。作者从两个方面对“汀版”刻书状况进行了研究与整理，一方面较为系统地介绍四堡书坊崛起的历史渊源和人文背景，充分论证了四堡书坊是继明代建阳之后的又一全国性刻书中心之论断。作者以翔实的史料，揭示了四堡刻本即“汀版”的特征与价值，明确了四堡刻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而对四堡刻本分门别类，比较详尽地叙述了版本的形态、作者、内容、评价与版本流传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另一方面，作者提供了大量四堡刻本实物的图片资料，这些古籍实物是作者经十多年穷搜博采得到的。这种第一手的资料，为文中论点平添了可信度，同时也为读者展示了书坊刻书直观的情景。对“汀版”进行系统研究，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开风气之先，走创新之路，这大概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总之，观之全书，其论点新颖，论据可靠，叙述有序，文字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相信此书的出版，会推动学界对“汀版”的关注，进而发掘流散海外的四堡刻本，是可以期待的。

2013年夏于厦门会展南二里寓所

（本文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第四届、第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七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自序

书籍是人类文明承传与传播的主要载体，而书坊生产又是书籍雕版印刷的基本途径。坊刻与官刻、家刻，通常被视为雕版印刷的三大门类。17世纪中叶，在闽西客家的一个小山村，由一群乡民自发地创办生产书籍的书坊，并以家族为纽带自主经营，代代相传，他们“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刷印，贩行远近”（杨澜《临汀江考》），最终形成拥有数十百计堂号的书坊集群，这就是清代刻书名坊——四堡书坊。

四堡书坊，是继明代建阳刻书业衰落之后的又一全国性的刻书中心，其坊号之多、印量之大，位列清代书坊刻书前茅。所刻之书，时人称为“汀版”，成为清代刻书的一大版别。本世纪初，尘封多年的四堡书坊又被重新提起，引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家文物部门授予其遗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雕版工艺亦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对这一濒危的人类文化遗产，人们应当尊重它、珍惜它、研究它。

四堡书坊的创立与发展，是清代刻书业的一大奇迹，的确是值得众人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古老的书坊建筑、刻本书籍和刻版以及其他元素，构成了丰富的四堡书坊文化。然而，近年来人们对四堡书坊文化的研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遗址建筑、族商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而对它的产品即四堡刻本的研究与发掘，几乎无人问津。笔者以为，这些刻书元素是缺一不可、密不可分的，其中刻本书籍是最基本的，忽略对刻本的研究，犹如人类的生中不管婴儿而只管产妇，必然失去其研究意义。

笔者对四堡刻本的发掘与研究，发端于20世纪末在龙岩工作时途经连城县的道听途说。这些带有神奇色彩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心尚能将四堡书坊刻印书籍挖掘整理而展现读者面前，犹如将被人遗忘在一片荒芜中的孩子抢救出来，可谓为传统文化的弘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

而，愿望与现实的距离毕竟很远，实现目标彼岸的困难，主要来自书坊刻本经过数百年自然和人为的消耗，已经十分稀少。为寻觅这些刻本，笔者备尝艰辛，曾多次自费到实地参观考察，访问农户、出入小巷，从购买第一本四堡刻本算起，久而久之，已达63个堂号103个品种500多册书籍。笔者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对所有藏品进行了整理与研究。经过15年不懈努力，最终完成拥有20多万字、300多幅插图的拙作——《四堡遗珍》。

本书冠名为“四堡遗珍”，旨在通过对四堡书坊源流、各类版本内容与特征的介绍，揭示书坊文化的内涵和四堡刻本的价值，从而展现清代刻书名坊、客家文化精华——四堡书坊的风姿。笔者从版本学的视角，对四堡书坊及刻本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方法可归纳为：合一分一合，即先概要地介绍书坊与版本一般形态，然后将版本分为诗文书画、通俗文学、蒙学科举、居家日用及套红、活字本等诸类叙述。全书辟为十二章，分为四个部分，即书坊概况与刻本价值描述、版本介绍、书坊人物、刻本图录。而对章节的叙述大体亦如此，先描述某类书籍的概貌，然后依次介绍数种书籍的详情。版本介绍以四堡乡当地或周边文人的作品为主，着重叙述其版本形态、作者、内容、评价与版本流传等。

笔者不揣浅陋，对四堡书坊与刻本并未停留在一般性介绍或说明上，就某些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诸如，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四堡书坊的缘起，论证了四堡书坊的历史地位；以翔实史料阐述四堡刻本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而揭示四堡刻本的文献性、历史性与民俗性价值。同时，对书中涉及的某些学术问题大胆地提出个人意见，为之进一步探讨或商榷，如：四堡雾阁人邹圣脉参订的《三国演义》五十一卷本，是否毛评本的第一个版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还是曹雪芹本人；毕昇发明的是泥活字印刷，它不等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木活字的发明应在泥活字发明之前；铜活字究竟是铸造还是雕刻，学界长期争论不休，铜活字实物表明它是铸造的。还须说明，本书所辑版本绝大部分是作者拥有的第一手资料，多数是首次披露的。

笔者生来愚钝，年近花甲，学无所获。限于学识，书中难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Content

序 / 杨国桢

自 序

第一章 四堡书坊概论 / 1

- 一、四堡书坊缘起……1
- 二、四堡书业之形成……8
- 三、四堡书坊的历史地位……16

第二章 四堡刻本价值与特征 / 30

- 一、四堡刻本概念的提出……30
- 二、四堡刻本的认识误区……39
- 三、四堡刻本价值评判 ……46

第三章 诗文书画集 / 54

- 一、诗文书画集综述……54
- 二、诗文集……59
- 三、书画集……78

第四章 通俗文学（上） / 86

- 一、通俗文学刻本概述……86
- 二、通俗小说 ……93

第五章 通俗文学（下） / 107

- 三、戏剧 ……107
- 四、评书 宝卷……112

第六章 启蒙教育 / 121

- 一、私塾与启蒙教育……121
- 二、蒙学读物……123
- 三、客家杂字……133



第七章 科举教育 / 151

一、科举制与四堡刻书业……151

二、科举读物……157

第八章 居家日用(上) / 171

一、居家日用读本概述……171

二、酬世类刻本……175

三、生活小百科……185

四、字典、韵书……193

第九章 居家日用(下) / 199

五、医书……199

六、术数类读物……209

第十章 套印、活字印刷与版画 / 224

一、套红、袖珍本……224

二、活字本……230

三、版画艺术……237

第十一章 书林掇英 / 255

邹学圣……255

邹葆初……255

邹圣脉家族……256

邹廷忠……257

邹尚忠家族……258

邹秉均……259

邹子仁家族……259

邹翼顺家族……262

马驯……263

马维翰……263

马氏三兄弟……264

马定邦家族……265

马权文父子……269

马松存家族……270

马源锡家族……271

第十二章 蒙学大家邹圣脉考论 / 274

一、布衣出身 一代硕儒……274

二、博古通今 勤于著述……277

三、传世作品 影响深远……280

四、简短的结论……285

附件一：四堡刻本总目录 / 287

附件二：思书轩藏四堡刻本目录 / 293

后 记 / 297



第一章

四堡书坊概论

一、四堡书坊缘起

四堡书坊是指清代以“四堡”地名冠名的民间雕版印书的手工业作坊。“四堡”地处闽西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四县结合部，昔时有“四县共靠”之意，故得名“四堡”。其行政区划原属福建汀州府长汀县，1951年划归连城县管辖，现为行政镇建制。这里的“书坊”，不是特指某家单个书坊，而是泛指地处四堡区域的上百家堂号构成的书坊集群，主要集中于雾阁邹氏与马屋马氏两姓。清朝至民国，这里的书坊群雕版书籍遐迩闻名，久而久之，人们习惯称其为“四堡书坊”。

书坊，又称书肆、书林、书棚、书铺，是旧时民间印刷或出售书籍的机构。书坊的兴起与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有直接的关联。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学术界一般认为始于唐代早期。在公元7世纪间，民间就有在木板块上雕刻文字然后用纸张刷印的读物。据考古发现，上世纪40年代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刻印于约704—751年之间，为目前已知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随着私家印刷书籍的增多，专门从事印刷和出售书籍的机构即书坊随之而生。

纵观1000多年的书坊发展史，书坊大致可分为生长期（唐、五代）、兴盛期（宋、元）、成熟期（明）、转



四堡书坊展览馆



作者与乡民



四堡书坊群（四堡乡吴德祥先生提供）



马屋小巷（四堡乡吴德祥先生提供）

型期（清）四个历史时期。北宋之前，书坊雕版印刷已较为普遍。如五代时期，不仅民间盛行刻书，官府也刻印儒家书籍。两宋至元代，刻书业大为兴盛，以刻书为世业者不乏其人，蜀、浙、闽三地尤为著名。南宋朱熹《答胡季随书》：“误本之传，不但书坊而已，黄州印本亦多有。”^[1]可以印证南宋书坊刻书之盛况。明代书坊林立，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等地刻书业名噪一时。清代书坊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各州、府、县几乎皆有书坊刻书记录，所刻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清末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的兴起，传统书坊日渐式微，最终被新兴的石印、铅印技术所替代。

四堡书坊是清朝、民国图书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四堡雾阁、马屋阡陌相连，鸡犬之声相闻，邹、马两姓村民世代通婚，从清朝初期起至民国末年止，皆以刻书为业，经营书业长达三百余年，可考的书坊达 123 家、书籍 1223 种。清杨澜在《临汀汇考》中说：“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刷印，贩行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担，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富将多藏，食旧德服先畴莫大乎！是胜牵车服贾多矣。”^[2]杨澜，字蓉江，长汀人，乾隆己酉（1789 年）举人。《长汀县志·物产志》（民国版）称：“邑四

堡乡昔多以书版为业。刻印制订发行颇广。”^[3]余国琛嘉庆二十五年《邹氏族谱序》说：“予又闻其乡耕读常业之外，储古籍雕版，装为绡帙，以应士大夫觅购者，不可胜计，此实有俾于文教。”余国琛（生卒年不详），清拔贡廷试第一，历任兵部武库七品京官、石门县知县等。《范阳邹氏族谱（五修）》说：“乡多书肆，雕梨刻枣，古籍几于汗牛，不胥而走四方。”（1947年，家训四条）

国家文物局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1898—1958）在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的一次学术会上提出，四堡书坊是我国清代四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与北京、武汉、洺湾齐名。厦门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1911—1988）也提出，四堡书坊在清代雕版印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刻书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可与明代建阳刻书相媲美。他还从我国经济史的视角提出，四堡刻书形成的独特族商文化有其研究价值，并促成他的研究生介入这一课题。^[4]

2001年7月，四堡书坊古建筑群被国家文物部门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雕版工艺亦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四堡人世代相传的印刷业的停业，原来的印书房全部改为家居房，再加上书坊地处偏僻山区，交通闭塞，书坊遗址很少遭到人为毁灭性的破坏，原生态的遗址得到比较好的保存，成为我国唯一幸存的古代坊刻遗址，也成为再现四堡书坊往昔辉煌刻书历史的实物证据。



书坊遗址

任何事物都有其开端，揭开事物的起源对事物本体的研究有其不寻常的意义。四堡书坊究竟源于何时？创始人是谁？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大致有南宋说、明万历说、明成化说和清初说，其中明万历说、清初说比较流行。

南宋说 认为四堡书坊起源于南宋，依据是，国家图书馆保存数种署有“汀郡”字样的南宋刻本，如《古灵先生集》、《嵩山集》等署“临汀郡斋”，“汀郡”即长汀四堡乡。其实，汀郡乃长汀的古代称谓，非仅指四堡乡。据《唐史》载，长汀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县，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设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汀州为临汀郡，入宋后仍称临汀郡。而四堡是宋代以后汀郡的一个乡，它们之间在行政区划上是一种隶属关系。四堡乡民的始祖于南宋末年才从各地陆续迁入，此时不太可能出现刻书之情景。况且，临汀郡斋刻本据其版式特征可能是官刻本，而四堡刻本则是坊刻本，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刻本，不能混为一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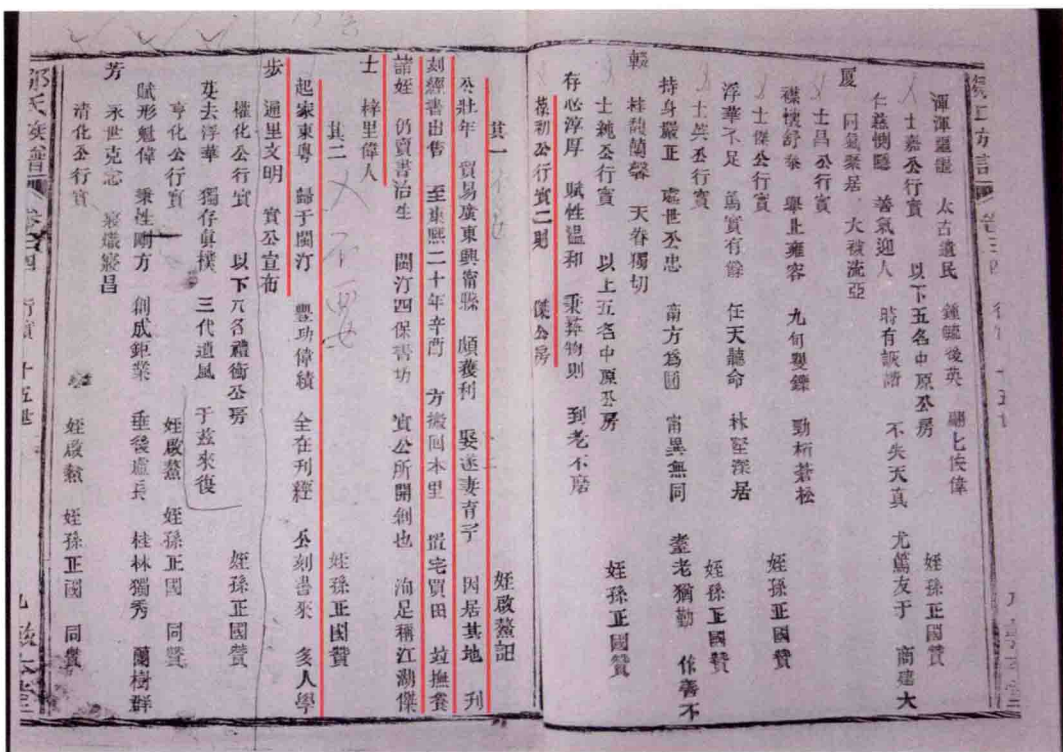
明成化说 明成化年间，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广巡抚马驯告老还乡，将汉口的印刷术引入家乡。马驯（1421—1496），字德良，长汀四堡马屋人，进士出身，累官至户部主事、郎中，四川布政使、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广巡抚，封政议大夫。马氏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告老返乡回到长汀，定居城郊十里铺逾10年，但马氏还乡时有否带回印刷术，方志和谱牒均无记载，它仅是马屋一带的传说。

明万历说 相传明万历年间，时任杭州仓大使的邹学圣辞官归里，其妻（杭州人）因孩子教育问题不愿随夫回乡，遂将苏杭元宵灯艺和印刷术（含雕版）带回，以换得她乐意成行。对于此说，笔者始终不以为然，因为这一传说明显带有人为编造的痕迹，留有破绽。道理很简单，读书与刻书是两码事，读书需要多种教材，而刻一两教材几乎无法满足小孩的需要。殊不知，刻书是一件极为费工、费力的事。当时的科举教育已相当发达，即使是地处山区的四堡乡村购买一些教材应该不成问题，邹氏完全没有必要为小孩的读书带回雕版自己去印书。

清初说 认为四堡书坊最早创办于清初康熙年间，创始人为四堡雾阁村人邹葆初。《范阳邹氏族谱》（民国版）称：十五世邹葆初“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又称颂其“丰功伟绩，全在刊经，公刻书以来，多人学步，通里文明，实公宣布”。此说获不少人赞同，但也有人怀有疑问。

以上四说中“明万历说”影响颇为广泛，20世纪90年代《长汀县志》、《连城县志》、《龙岩地区志》等均有记载，也被众多学者所引用。但此说至今未发现有任何史料依据，而没有史料支持的任何说法仅仅是一种“假设”或“猜测”，是不能作为科学论题的。此说之所以盛行，可能与传统的官本位观念有关。历史上有不少人往往借助官位、官声显赫自己的家族史。此说很明显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某些人看来，似乎





邹葆初事迹

邹学圣任过“杭州仓大使”，四堡书坊起之于官家与起之于平民大不相同。笔者认为，四堡书坊初创于官家或平民并不重要，许多历史都是草根百姓创造的。其实，“仓大使”是明代掌管仓库的未入流小吏。《中国历代官制词典》载：明代仓大使从属于布政使及州县。“明承宣布政使司属官有仓大使一人，从九品，掌仓库储藏之事。下有副使一人。州县皆置，为未入流小吏。”^[5]倘若邹学圣未创办书坊，而以其曾任职仓大使硬把创始者的名义加在他头上，借以显赫书坊的历史，这是相当滑稽的，也是大可不必的。

笔者倾向于四堡书坊始创的“清初说”，认为清初邹葆初最早创办书坊是有事实依据的，是可以成立的，其理由有三。

首先，《邹氏族谱》明确指出清初邹葆初是四堡书坊的创始人，“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清初说”是以上“四说”中唯一有书面文字记载的，其他“三说”，有的是口头传说，有的为时人臆造，故事编得太过牵强，不足为凭。诚然，族谱不是信史，但其基本内容也要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尤其是像刻书一类的大事件绝不可以随意胡编滥造。清朝四堡地区姓氏多达十几个，如果书坊不是邹姓人邹葆初所创，邹氏族谱所云很可能引起外姓人的不满甚至反对，族谱编修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伪造自己家族的刻书历史。

